爱的色彩

■ 秋凡

我和老公刚认识,公公就被查出得了重病。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回来,公公被两个儿子安排在区人民医院里输液静养。医院里,老公牵着我的手,对公公郑重地说:“我们刚刚领完证。”公公微笑地点点头,宛如一位老师看着屡屡逃学的学生终于递交了满意答卷,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来。

翌日,大哥和老公因为工地上的工程项目赶工而飞往异地,留下我在医院里独自照料公公。公公在医院待了两天,坚持要带我到城里逛一圈。我因为常年不在家,对开州城区确实不如公公熟悉。

随着公公停下的脚步,我抬头一看,愕然失色。环顾四下,一排排花圈、纸幡等殡葬用品成堆摆放,店内货架上成捆的黄裱纸、冥币、香蜡格外引人注目。

我正纳闷着,店主问我,给谁买啊?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讪笑着说,随便看看。公公头也不抬地说:“给我自己买,量大有没有优惠。”

给自己买纸钱,估计店主也是头一回碰见这种“狠人”。他觑了公公一眼,对不同价位的黄裱纸作了详细介绍后,又饱含深意地盯着我,热情地说:“那就买这种,最贵也最好,对老人也是表孝心。”

公公一眼识破他的“小九九”说:“儿子儿媳对我孝顺得很,但再孝顺也不能胡乱糟蹋钱。”

店主拿出另外一扎黄裱纸递给公公说:“这种怎么样?价格很划算。”

公公接过来,捻了捻,看了两眼,嗅了嗅,说:“这个不行,烧出来烟多,还呛喉咙。”他指着另外一扎黄裱纸,问这个多少钱?

店主直夸公公懂行、识货,这款卖得最好,性价比也最高。

谈了半天,最后结账时因为几元钱和店主没谈拢,公公梗着脖子怼了几句,掉头就走。而后,公公拄着拐杖,逛了一家又一家的香烛店,直到买到物超所值的纸钱为止。

回家的时候,我打算叫辆出租车,被公公阻拦下来。他说出租车贵,不如叫辆摩托车,却又因为一元钱和摩的师傅谈崩,最后决定乘公交车回家。他一边走一边说,他们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们该节约的时候要节约。

穿着高跟鞋的我被公公的执拗彻底打败,脚钻心地痛起来,有种遭受莫大“欺骗”的委屈:兜了那么大一圈,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想乘公交车。我心里嗤之以鼻道:“你儿子的一包烟钱都顶来回十余趟了。”

公公见我脸色不悦,不再说话。他站在公交站牌下,伸长脖子耐心地等着公交车的到来。放下笨重的麻袋,公公的腰杆跟手杖一样挺直,身体像站牌一样高大。我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拉出了一大段拒绝靠近他、靠近麻袋的心理距离。他对我的漠然始终保持沉默,就像站牌一样孤独地沉默着。

公公猛一回头,我在他泛黄的眼睛里看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愁——一个花甲老人在人烟罕见的道路上踽踽前行,天色将晚,无风也无雨。路的终点立有一块风尘遮掩、字迹模糊的石碑,他用手擦拭干净,定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时间的尽头”。蓦地回首,两个小男孩朝他遥遥挥手,再回首,小男孩已变成了青年男子,又回首,两个中年人的背影离他越来越远,他不舍地目送他们走向没完没了的忙碌中去。他一言难尽,回过身来,毅然决然地走向时间的尽头。

我被这种日薄西山的悲壮感染,倏尔愧疚不安。

公公歉意地看着我说:“今天让你受苦了。”

我惭愧地说:“不,是让您受苦了……您好好的,怎么就想去干这活儿呢。”

公公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自己的身体自己了解,你们也不用瞒我。这些活儿你年轻不懂,被人坑了都不知道。他歇了口气又说:“这活儿我不安排好,突然撒手走了,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忙出大错来,被人说闲话不好。”

我听完,如鲠在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快要到家的那一段路,百步石梯沿坡而下,我脚踩高跟鞋手提大麻袋,每走一步就是对自我的挑战。大麻袋在重力的作用下,推着我如弱柳般摇晃前进,给人随时就要连人带物一起滚落下坡的担忧。

公公说:“我们调一下位置,你走后面,我走前面。”他在前面颤颤巍巍地艰难探路,紧握手杖、瘦骨嶙峋的手,因为用力而青筋暴起。

到家后,我瘫软坐下,许久不愿动弹一下。公公休息片刻,拄着手杖又去检查那袋纸钱是否在我的拖拽过程中受损、沾水,确定完好无损后,方才坐下来,长吁一口气。

一个月后,在公公的灵堂前,我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同大哥和老公聊起公公料理自己后事的那些事儿。大家都说这纸钱选得好,易燃且烟雾小,就这两兄弟被熏出了两行泪。

转眼公公躺在地下已有十一年,每年我们都会买最好的香蜡纸,领着一家老小到坟前祭拜。

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懂事”的公公,太让人心疼,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想的念的还是他的孩子,连“死”也要照顾子女的周全、体面。这爱冷峻克制、委曲求全,在所有爱的画面里,基调暗沉、凝重,整体色彩都不缤纷艳丽,甚或可以说都掩映在沉寂里。但这就是中国式的父母,他们的爱如传统中国画,笔墨苍劲,构图丰满,含蓄深沉,意蕴绵长。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又到中元节

■ 李星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开州人对七月半这个节日很重视。从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每天都有人进行祭祀活动,那情形一点也不亚于清明节。七月半也叫中元节,我们这里叫七月半的多。

每年中元节,母亲都要早早地提醒并亲自操办,母亲说这是老一辈前传后教的风俗,是纪念祖先。因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深爱着父亲,因此,母亲很看重中元节。她认为对中元节的重视是对父亲爱的表现,是对老辈子的尊重和纪念。

七月十五这天,母亲一大早便从街上买回各式各样的祭祀物品,然后分成一包一份,在纸钱包上写上收包人的名字。我家这种活一般都是我来干,母亲说现在家里只有我会写了(父亲在的时候是父亲写)。我在写纸钱包的同时,母亲开始忙着做饭,因为在烧祭品的这一天,要“宴请”老辈子们。早上,母亲特别叮嘱我们,“宴请”老辈子时不许乱说话。十一点左右,母亲便做好了饭菜,开州典型的八大碗摆满饭桌,菜肴很丰盛。母亲都满脸虔诚地说,请我家老辈子回来吃饭,便一一念叨老辈子们的名字。十分钟后,母亲用一个土碗将所有老辈子们“吃过”的米饭倒在一起,放在那里,到了晚上烧祭品的时候再用,然后将所有的筷子拿到厨房洗刷一遍,我们才开始吃饭。

晚上八点半,去焚烧祭品的时间到了。到规定焚烧祭品的地方还有一段路程,我们一般开车去。这个时间段正是焚烧祭品的高峰期,我提着祭品跟在母亲身后小心翼翼地走着,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地方,母亲找了三块石头架好,在上面铺一点干树枝和报纸,然后将写好的纸钱包平铺在上面,虔诚地点上香烛,蹲下身子,亲手将纸钱包点燃,母亲说大钱包是烧给父亲和自家老辈子的,散钱是烧给孤魂野鬼的。看着那跳动的火焰,母亲不禁悲从心中来,一边焚烧一边念念有词,大抵是保佑一家老幼平安之类的话。青烟袅袅,我也不由泪光盈盈。等祭品烧完,母亲便让我跪下作揖,显示对老辈子的尊敬。在快烧完的时候,母亲将带来的土碗里面的饭装上一点水泼在地上(至于起什么作用至今我也不明白),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回家,就算送完老辈子了。

尽管我不迷信,但逢中元节时,我也会按照家乡的风俗和母亲的言传身教进行祭祀。父亲您可曾知道,我有多想您,为了不让岁月风干了记忆,父亲这样的字眼,曾经无数次烙疼我的心。那个极难消失的佝偻背脊,在灯晕下、在残阳里,让我空空的心膨胀起无限思绪。父亲不是幻觉,幻觉也不是我,一种真实的具象,我遂把感念深长的相思,锻成一把雕刀,在流血的心灵深处,刻下深一脚浅一脚的遥祭……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父亲

■ 郭小勇

时间如飞驰的列车一晃而过,转眼间,父亲已离开我三个年头。

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工作之余、睡梦之中,与父亲“相见”的次数却越来越多,画面一次比一次清晰,对父亲的思念在逝去的时间里越熬越浓。

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父亲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一生能拿上桌面炫耀的事情少之又少,唯一的一件还是他的舅舅、叔叔告诉他的,那就是他的出身和童年生活,但他对此没有半点记忆。

1943年,父亲出生在南雅镇一个开始没落的大地主家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父亲出生就有奶妈照看,在同村孩子眼中,父亲绝对是“少爷”般的存在。

世事难料。父亲三岁那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六岁时,他的父亲又离他而去。他和大几岁的姐姐一下变成了孤儿,靠姑妈、叔叔等同族长辈救济生活。

1954年,父亲的姑妈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离开了人世,失去资助的父亲只能依依不舍离开学校回到农村。

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想吃顿饱饭在当时都是奢求。为了活下去,父亲的姐姐嫁给了铁桥镇南山上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不久后,父亲也跟着姐姐上了南山。

在姐夫的帮助下,父亲搭建了一间茅草屋,并在煤矿找到了一份下井挖煤的工作,过起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1966年,四川省雷波森工局来开州招工。雷波县地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条件十分恶劣,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我就不信比挖煤还辛苦。”父亲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几经波折到达雷波森工局后,父亲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乡被分配到212林场。

经过简单培训后,工人们分别从事伐木、养路、机修、运输等工作。父亲因挖过煤,身体素质好,成了一名伐木工。

伐木工是林场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刚开始没有电锯,伐木工只能两人一组,靠拉钢锯伐木。父亲和他的搭档九死一生才达成了默契,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1968年春节,父亲回家探亲,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母亲,两人一见钟情。婚后,母亲随父亲去了雷波森工局。

1970年,父亲有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哥。1974年,我出生了。我的出生对于父母来说应该是个意外,因为他们原本没打算要二胎,不知是当时检查设备不准还是医生没说实话,说怀的是个女儿,父母才同意生下我。我出生后,虽然不是女儿,但已成既定事实,父母也只能坦然面对。

我小时候肠胃不好,父亲听一位老中医说鸡内金可以治我的病,从那以后,不管谁家杀鸡,父亲都会厚着脸皮去要回鸡内金,用柴火烘干磨成粉后熬米粥给我喝。

很快我到了读书的年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从不过问我在学校的情况。“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我的责任就是让你吃饱穿暖。”每当我埋怨父亲时,他总是这样说。直到我当了父亲,才体会到父亲是因担子太重,只能把对我的关心、关爱藏在心里。

1990年,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了四川省西昌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很少喝酒的父亲让母亲做了几个好菜,把自己灌了个半醉,不善言辞的他话也多了起来。“你3岁那年有天发高烧,当时雪下得很大,我背着你在齐膝盖深的雪地里,走了几个小时才到医院。”那晚,父亲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从父亲的话语中,我才真正认识了父亲,这么多年来,他把对我的爱都深埋在了心里。

父亲在林场少言少语、与世无争,事事都让人三分,让我觉得他很懦弱。“争赢了也不多长一块肉,争输了还生闷气伤身。”父亲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

父亲平淡无奇的日子一天天飞逝,很快他到了退休的年龄。可能是在老山林里待得太久的缘故,刚退休那几年,父亲还无法适应家乡的生活,有些茫然,每天不是长吁短叹,就是与电视为伴。

1998年,我儿子出生,父亲如获至宝,生活才有了乐趣。父亲有事没事就逗孙子玩,一向节俭的他也变得大方起来,给孙子买东西,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儿子读书后,父亲也总是争着接送,他还监督我儿子完成作业。“以前工作忙,没时间照看你,现在好好照看一下孙子,弥补一下心里的遗憾。”对于孙子的爱,父亲从不掩饰。

在父亲的一路陪伴下,我儿子读完高中,考上了大学。“孙子一直都是我带的,现在都读大学了,了不起吧。”孙子读书厉害,成了父亲时常炫耀的事。

2017年的一天,父亲说胃疼,去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发现肝和胆上有低密度影,怀疑是长了肿瘤,需要进一步检查。我没有把实情告诉父亲,只说是胆结石,需要尽快手术。为了方便医保报销,我们商定到四川省林业厅职工医院去检查治疗。

四川省林业厅职工医院位于成都市,当天我们开车赶到成都市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那晚成都下起了倾盆大雨,让我本就忧伤的心情跌到了最低谷。

第二天一大早,雨停了,父亲早早起床出门,在酒店外转了一圈。“退休后就没来过,成都变化太大了,现在都找不到方向了。”眼前的一切,让父亲既兴奋又失落。

“不论检查出来是什么病,都要告诉我,我不想稀里糊涂地活着。”检查前,父亲对医生和我恳求道。没有奇迹发生,通过检查,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当医生将这个结果告诉我和父亲时,我如同五雷轰顶,父亲却异常平静。

“无论手术与否,大约还能活3年。”医生给出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案,父亲选择了手术治疗。因为医生说过,手术后可以减轻不少痛苦,病人活得更有尊严。父亲大概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吧。

做手术的头一天,父亲让我带着他去了武侯祠、荷花池,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他几十年前来成都还记得的地方,他想再去看看。

“都快8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怕不怕的。”手术做了6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苏醒后的他反而安慰起我和母亲来。

父亲很坚强,手术10天后就出院回家了。从那以后,父亲变得乐观开朗多了,每天和左邻右舍摆摆龙门阵,还买了一台收音机,时不时听一听他打小就爱听的川剧。

“我一定要送你去读研。”2020年10月,儿子考上了研究生,2021年9月就要去新的学校读研。此时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父亲兴奋地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送孙子去读研。

父亲的愿望终究还是没能实现。2021年2月,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父亲走得平静而安详,保留了他与病魔斗争后应有的尊严。

“雷雷研究生毕业没有,工作找到没有,你母亲身体还好吧……”昨夜我又梦见了父亲,他在天堂那边仍牵挂着我们。梦醒后,枕巾已被泪水湿透,我心里默默念叨着:“父亲,我想你了!”

(作者系开州区融媒体中心职工)

遥寄中元夜

■ 徐守植

把这些记在心中
刻在石头上的名字
写在你们专属的信封上
一点一划每一笔
牵出来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每一个名字
都曾经是一张最温暖的笑脸
那些只属于我和你们的故事
现在成了我和孩子们
常常聊不完的话题
而今夜我又一年的思念
正乘轻烟而来 乘风而去
我呼唤你们回家
就像当年你们呼唤我回家
把那年的经历又一次演习
不用邮递员 熊熊火光
那些飞舞的纸钱
是你们都到场来领取
这中元夜如水的月光
照亮了你们的路途
在这数千年不变的节日习俗
我把我的一片冰心遥寄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云遮归途

■ 刘成

清晨淡蓝微光的天幕下,一条平坦开阔的乡村公路在苍山间蜿蜒。后排坐着的陈姨这时突然说,那座山翻过去,就是老家了。老K的妻子雅静从上车就一直忙着照顾两个孩子,她这时也招呼孩子们去看陈姨说的那座山。

自幼生长在北方的两个小姑娘,因为早起,现在还睡眼惺忪,她们似乎对眼前的景物兴趣索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说:“想不到这段路风景挺好的。”始终沉默开车的老K听了点点头。陈姨问我以前来过这里没?我笑着摇头,又去问老K同样的问题。老K说:“当然来过,小时候每年过年,我们一家特定在初二那天,回老家拜年,风雨无阻……”老K的眼神有了片刻的迷茫之后又变得清明,车越往前开,阳光越发亮白,路面慢慢变窄。

爬完一段陡坡,一块枯败的田地映入眼帘,四周那么静寂,没有人烟。陈姨说,以前这里山上山下都住满人,可热闹了,后来所有人都搬迁去了外地。车再往前开,路径两旁种满了柑橘树,每棵树上都结满发亮的青柑,好似眼睛一样,在打量这一车异乡归来的游子。被坐得满满当当的车里,是老K的家人,除了我。只是,从前的气氛担当康叔现在只能安静地待在一只小瓷罐里,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一定比车上的任何人都活跃,因为这是他心心念念的老家,在他生命最后时刻都想回来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老K停稳车后,自言自语地对着空气低沉地说了一句:“老汉儿,我们到了。”

去年5月,死党老K的爸妈---康叔陈姨回京后,康叔的身体每况愈下。北京疫情暴发那段时间,老K排除万难,奔波在各大肿瘤医院和家之间。空闲下来他在电话里给我讲那段时间带着他爸去京城各大医院求医的经历,他说他就想让他爸多活几天。

去年中秋前夕,我看到视频里的康叔瘦到脱相,原来一头浓密的头发所剩无几。想到从前那个永远精神抖擞的长辈,也不胜唏嘘。对于康叔的病况,我和老K都心照不宣。再通话时我问老K,康叔百年后的去处安排。老K说他爸最早的意愿是骨灰撒到海里,这一说法马上被老K一口否决了。后来他爸又说想回老家,陪在他自己娘旁边。老K沉声问他爸:“老家那么远,我想你了咋办,想跟你唠个嗑都不行。”最后老K哭着求他爸:“爸,我还是想你留在北京,留在我身边。”陈姨后来对我说起当时的情形,她说老K紧紧地抱着病入膏肓的父亲,哭得稀里哗啦。跟老K相识近40年,老K是个重情义却又十分理性的人,我无法想象他在生死面前情绪崩溃时的样子。好在老K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康叔葬在北京某公墓,对此康叔自己也没啥意见,但他特别嘱咐老K要带一部分骨灰,回开州老家埋在老K奶奶坟边。康叔说他长大后常年在外,很少有时间陪在他娘身边,他想百年后能去陪他娘。

去年12月底某个下午,老K在电话里语气异常平静地告诉我,他爸走了,走得很安详。我正要开口说一些安慰的话,老K说,他有心理准备,什么也不用说。接着老K又说,明年他们全家会回开州一趟,把他爸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他奶奶坟边。这是他爸临终的遗愿,他得帮他完成。

8月的乡村土路,在越发刺眼的阳光照射下逐渐干裂,布满灰尘。

我们步行中途,老K的一个远房堂哥跟上来,移民后他几经辗转又回到了这片亲厚的故土。那有着山一样厚实背影的中年汉子扛着一把锄头在前面带路,老K抱着他爸的骨灰紧随其后,我提着一大包香蜡纸钱走在队伍的最后。脚下崎岖的山路杂草丛生,已经看不清路面,老K在回来的第二天就提前来过一趟,他说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变化很大,可能到时他妈都认不得路,他要事先去把路探好,找到他奶奶的坟。然后,老K又说:“送我老汉儿回去那天你也去嘛。我妈说不惊动外人,我说得叫上你。”

我点头答应,一切很自然,像少年时代某次相约一起外出那样自然。

穿过一片幽暗的竹林,走在前面的人在一座坟墓前止步,坟上长满了青苔和杂草。陈姨端详着坟前的墓碑好一会儿才无限凄楚地说:“老康,我们带你回来了,回你妈妈身边来了。”

老K的远方堂哥跟老K商量过后,便开始在老K奶奶坟前左侧挖出一个浅而小的坑来,老K在一旁打下手,他想每一个环节都有他自己的参与。雅静取出供果装盘,当一切准备妥当,老K才从纸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装了他爸骨灰的小瓷罐,清理掉包裹在外面的那层青纱,天青色小瓷罐隐隐透着温润的光泽。老K微微颤抖的双手将小瓷罐稳稳放入挖好的坑里,再一下下刨土掩埋。一旁的陈姨开始哭泣,站在对面的雅静也跟着红了眼眶,在她身旁肃然而立的两个小姑娘一脸懵懂。

那些深厚的故土情怀在年轻一代已然淡漠,而年幼的孩子又如何能一时想明白,但也会在她们小小的心间留下一份念想,让长大后的她们能在某一个时刻想起今天的所见所闻。她们总有一天会懂得,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庭,三代人之间至死不渝的牵挂和深情。

眼前,一座高高的旧坟左侧前方,是那座矮矮的新坟,就像一个孩子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康叔,你并没有离开。在家人的陪伴下,你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回到老家。你的安息之地前芳草如茵,从今以后你就守在你娘身旁,陪着你娘,朝迎旭日升,暮送夕阳下。

好似这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